| 选题(20%) | 说理(60%) | 文笔(20%) | 总分 |
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|
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|

作者: 杨雨洁

学号: 1700015179

学校院系: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

提交日期: 2020年12月19日

## 经济学视角下中国人口老龄化原因与挑战

近年来,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严重。人口结构失衡部分源于计划生育政策,但本质上取决于育龄人口对生育"收益—成本"的经济学权衡。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导致生育率最优解下降,意味着老龄化现象将长期存在,依托"人口红利"的发展模式或不可持续。如何在新型人口结构背景下保证经济长期稳健发展,成为转型时期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。

## 一、 问题的提出: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

统计数据显示,中国在过去不到 30 年时间里便实现了人口增长模式从"高生育率、低死亡率、高自然增长率"向"低生育率、低死亡率、低自然增长率"的转变,而发达国家完成该过程一般需上百年时间。¹事实上,早在 2005 年,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超过 7%,达到国际通行的社会老龄化标准;但相比与其他老龄化国家,中国老龄化呈现出"速度快"、"未富先老"两大特征,<sup>2</sup>不仅迅速消耗曾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"人口红利",甚至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。

人均寿命提高与出生率下降是老龄化的两大直接原因,前者得益于不断完备的医疗养老服务体系;后者的影响因素则相对复杂。不少学者将中国陷入"低生育陷阱"归咎于计划生育政策,此观点固然有一定道理,但必须注意到"全面二孩"并未显著提高生育率,也没有提高主要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,毋宁说仅仅鼓励了那些原计划生育第二胎的夫妻。3故而,

<sup>」</sup>胡翠、许召元:《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影响的实证研究:来自中国家庭的数据》,《经济学》,2014 (4),第 1345 页。

<sup>2</sup> 刘尚希等:《中国人口老龄化、经济增长与社会化改革》,《发展研究》,2020(10),第 4-5 页。

<sup>3</sup>同上文,第6页。

政策性因素并不能很好解释人口老龄化。

## 二、 经济学视角下的原因分析

1987年,贝克尔便将经济学"成本—收益"分析方法引入对生育的研究。4他认为,随着经济发展、教育普及、医疗尤其是避孕技术推广,人口增长率主要取决于生育率而非婴儿存活率,生育率则取决于父母的生育计划。从收益角度,孩子兼有耐用消费品与投资品效用,可为父母带来持续快乐与未来收入。从成本角度,养育孩子的成本包括投入时间导致的收入损失,以及投入金钱带来的消费效用损失。在边际效用递减这一基本经济学假设前提下,易知养育孩子的边际收益递减,但边际成本递增,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了父母的最优生育决策。

具体而言,中国愈发深入的现代化转型对生育的直接成本、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均产生较大影响,进而改变均衡状态下最优生育率。

首先,在直接成本层面,技术发展与产业升级对人力资本提出更高要求。随着人力资本提高,社会也更倾向于采用人力资本密集型技术,故更高人力资本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收入。但教育程度普及也使得就业竞争压力日益激烈,进一步促使父母增大对孩子的投资,为其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。然而,在尚处转型期的中国,资本回报率依然偏高,加上土地供给的结构性失衡,城市房价居高不下;稳步推行的市场化改革则引起教育、医疗等价格波动。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,生育的直接成本迅速提升,故总资源给定时,父母的理性选择是少生育但加大对每个孩子的投资。

其次,在机会成本层面,父母(特别是母亲)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也起到关键影响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女性社会地位、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均显著提高,在生育问题上也拥有更多的自主权。性别平等观念影响了女性的决策偏好,她们选择将更多精力投入在工作而非生育和家庭劳务。但必须承认的是,育龄女性在劳动市场仍处于弱势地位,社会潜在的性别歧视使她们面临更高的生育机会成本,更多女性因担心丢失工作机会而放弃生育。加上女性本来就承担了生育的绝大部分风险,不难想象,有限的性别平等实际降低了女性生育意愿。5

最后,在预期收益层面,社会总产出提高为父母带来了多元化的消费选择,人们可以从 其他消费品获取快乐。同时,全国性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,亦减轻了养老的后顾之忧, 加之一些鼓励生育的传统观念在新生代适龄人口心中已普遍淡化,孩子作为投资品的效用被 削弱。6此外,女性地位(即使是有限)的提高额外降低了她们生育的效用,因为生育不再 是女性价值的唯一体现,女性也无需依靠生育更多男孩获取和巩固其家庭、社会地位。

## 三、 总结与展望

由此可见,中国人口老龄化主要归结于持续的低生育率,导致生育成本急剧上升、收益

2000字

<sup>&</sup>lt;sup>4</sup>【美】加里·贝克尔:《家庭经济分析》,彭松建译,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87年。

 $<sup>^5</sup>$  计迎春、郑真真。《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, $^2$ 018(8),第 143-145 页。

<sup>6</sup> 张航: 《中国低生育率困境成因探析》, 2019 (7), 第 14 页。

下降的若干因素包括产业结构转型人力资本密集型、市场化转型、社会观念转变、性别平等的保障与强化等。但显然这些因素大部分源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,甚至是后者追求的"成效"。因此,政府的生育政策并不能长期提高生育率,更无法根本解决人口结构失衡。悲观来看,加速进入老龄化或是中国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,如何在此背景下维持宏观经济稳健发展,避免陷入经济下行与人口老龄化相互促进的被动局面,也成为我国宏观政策一大难题。

当然,笔者无力在本文给出相应答案。但结合上文分析,笔者认为,与其绞尽脑汁以行政手段拉高生育率,毋宁聚焦于低生育陷阱背后的经济学逻辑。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,推动性别平等,保障育龄妇女的工作权益,提高女性生育意愿,同时积极挖掘新型人口结构可能存在的发展机遇,最大程度降低老龄化的负面影响,不失为一条可参考的思路。

WORD 批量转 PDF 工具-未注册 注册码购买 QQ: 3049816538(注册后本文字和以下内容消失)

成都购房咨询, 大专本科成都落户咨询, 成都社保代缴咨询 QQ: 3049816538

2000字